第一章
共和党对东亚问题的新观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凭借着它在战争中形成的巨大军事与经济力量，凭借着它为对日战争胜利而作出的巨大牺牲，以及凭借它在战争中所取得的战略优势地位，美国开始在亚洲地区谋求支配地位，并试图排斥对手和异己，按照它的理想将太平洋地区纳入美国的全球战略中去。但是战后的东亚已经不再是一个任由大国宰割的对象。民族主义运动已经席卷这一地区，社会主义政党在许多国家成为重要的政治力量。加之冷战从欧洲蔓延到东亚，苏联在这一地区开始实行与美国抗衡的政策，这使美国谋取支配地位的设想增添了更多的困难。

战争结束以前，富兰克林·罗斯福政府曾经设想，要使中国成为战后亚洲维持和平与秩序的力量。但是专制腐败的国民党政府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发动了试图消灭中国共产党的内战。出于冷战与支配亚洲的需要，杜鲁门政府对蒋介石的这一政策采取了支持与援助的方针。

然而，中国内战的进展却完全出乎杜鲁门政府意料之外。到了1947年下半年国民党政权在中国的统治出现了崩溃的迹象。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为了应付东亚局势可能发生的重大变化，加强对苏联的遏制，美国政府开始调整有关东亚地区的战略安排。这一调整的主要内容就是，以日本取代中国，建立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战略支柱，使日本成为美国在东亚的主要的战略基地和可靠的盟国。为此，杜鲁门政府停止执行一系列惩罚性的对日政策和措施。在政治方面，美国加紧扶殖日本右翼保守势力，打击日本国内的左翼进步力量。在经济方面，美国不再分解日本的财团势力和原来的军事工业结构。①

但是，对杜鲁门政府来说，虽然对日政策取得了预期的效果，但是国民党政权的垮台是其亚洲政策的严重失败，为此它不断受到共和党的强烈抨击，它的“遏制”政策被认为是一种对共产党软弱的政策。新中国的建立对东亚地区不断高涨的民族主义运动及社会主义力量发展产生了直接影响。不久，中苏两国结为同盟。1950 年 6 月又发生了朝鲜战争，这些发展使杜鲁门政府在东亚面临越来越困难的处境。

1951 年，为了确保日本在未来长久地留在西方阵营之中，并使日本重新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杜鲁门政府违背不单独缔结和约的战时同盟原则，排斥其他战胜国，精心导演了旧金山对日和会。为了在对日政策方面得到共和党的支持。杜鲁门于 1950 年 4 月任命共和党人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负责制定对日和约，为了强调这是“两党一致”的对外政策，杜鲁门还专门任命了两位共和党人参加和约的最后谈判及签字工作。②

① Michael Schaller, *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 :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As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85)

② “两党一政”意指战后美国两大政党在对外政策基本目标和重大问题上意见一致，两党在制定和贯彻有关政策时相互配合，并避免把对外政策问题引入国内政治争斗中去。

此时，美国国会中的保守势力竭力想阻止日本承认新中国政权，他们向政府施加压力，声称要以日本同台湾当局签订“和约”为美国正式履行“对日和约”的条件。杜勒斯为了确保“对日和约”得到国会的批准，他不顾英国的强烈反对，迫使日本吉田茂政府公开作出承诺，并在 1952 年 4月 28 日对日和约生效前与台湾签订了“日台条约”。这一措施实际上排除了日本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可能。由于“对日和约”完成了美国在东亚的多种战略需要，杜勒斯曾得意地说，这是美国在东亚首次获得重大的主动权，是苏联在战后遭到的最大的外交失败。① 为了让远东有关国家接受美国的对日政策，美国又同澳大利亚、新西兰签订了“美澳新条约”，同菲律宾签订了“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在这些条约的基础上，美国建立了一系列军事基地，加之它在日本、朝鲜等地得到的军事基地，美国建立了所谓的西太平洋沿海“岛链”防御线。

但是，这并不能改变杜鲁门政府在亚洲的处境。首先，在朝鲜战场上，民主党政府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局面。1951 年春，杜鲁门政府解除了麦克阿瑟的职务，明确了战争有限化的方针。并且制订了有关远东政策的 NSC－48 号文件。7 月，朝鲜战争作战双方在开城开始了停战谈判，到了 1952 年初，双方在有关停

①美国国会中的一批亲国民党保守势力被称之为“中国帮”。这些人与国民党政权的渊源起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其中共和党参议员有加利福尼亚州的威廉·F·诺兰，新布什尔州的 S·布里奇斯，新泽西州的 H·阿历克山大·史密斯，民主党参议员有内华达州的 P·麦卡伦，以及共和党的众议员明尼苏达州的周以德等人。关于两党在“对日和约”问题上的合作情况参见： David R. Kepley, *The Collapse of the Middle Way, Senate Republicans and the Bipartison Foreign Policy, 1948－1952*. (Green Wood Press, New York, 1988.) pp.133－139 ；也参见杜勒斯在参议院的有关证词， *Exective Sessions of Senate, Historical Series, 1952*, V.4, p.120.

战的许多重要问题上达成了基本一致的协议，但在遣返战俘问题上却无法达成妥协。为了实现扣留大批中朝方面的战俘的目的，美国坚持所谓的“非强制性遣返原则”。中朝两国则坚持要按日内瓦公约行事，全部遣返被俘人员。1952年春，杜鲁门政府决定以人道和道义为由，拒绝中朝方面的要求。谈判因此陷入了毫无进展的僵局。①

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1952年1月曾威胁说，朝鲜局势已经到了非常关键的时刻，或者能实现停火，或者就面临最严重的发展。1月8日，艾奇逊与英国当选首相丘吉尔会谈时也说到，“如果停战谈判失败，美国可能轰炸中国并封锁沿海地区。”但美国的战争威胁并不能迫使中国作出让步，在这种情况下，艾奇逊又摇摆退缩了。他清楚地知道，把战争扩大到中国意味着突破“有限化”方案，结局将无法预料。国务院5月27日决定，除非参谋长联席会议准备增加参战的军队，并同意逐步加强军事行动，否则国务院不打算改变目前“拖”下去的政策。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主任保罗·尼采估计，如果继续拖下去，地面作战行动会降到很低的程度，一种“事实上的停战可能出现”。

美国军方也不愿承担挑起全面战争、甚至新的世界大战的那种可怕的责任，因此，他们不愿主动改变现有的军事作战方针。

①有关美国阻止遣返全部中朝方面战俘的材料可参见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以下简称 FRUS) *1952－1954*, V.15, p.34, 44, 68, 69, 213 在美国政府的默许下，台湾国民党当局的特工以东京美军司令部工作人员的名义在战俘营活动。他们利用志愿军中原国民党被俘军官和黑社会势力控制部分战俘营，强迫志愿军被俘人员拒绝遣返，对坚持要求遣反的人进行迫害，甚至杀害。连美国驻南朝鲜大使馆官员也承认，如果允许自由选择，国民党控制下的战俘营的绝大多数人会逃到“亲共”战俘控制的战俘营去，“以躲避恐吓和被剥夺最起码的人身自由”。有关战俘营的报告见 *FRUS, 1952－1954*, V.15, pp.98－99.

但是，五角大楼也不愿意长期维持这种僵持和对峙的局面，因为这种局面既不能发挥美军的装备优势，也不能避免依然严重的伤亡。军方指出，如果政府决定不在谈判中让步，那么就必须考虑改变军事战略。显然，军方要迫使政府先作出政治决定。9月，在军方和国务院高级官员的一次联席会议上，空军参谋长范登堡将军指责说，朝鲜战争可能会无限制拖下去，而政府对下一步该做什么却一筹莫展，他说：“迟早你们必需有一个新的方针”。副国务卿帮办马修斯却把球踢回到军方一边，他说，如果国务院“了解军方在谈判破裂后想干什么的话，那样可能会使政府更容易知道，这场谈判是否应当中断”。军方同政府一样不愿意承担扩大战争的风险，他们坚持说应当由政府先作出决定。范登堡将军告诫政府说：美国人，特别是俄亥俄州和密西根州的人民现在十分不满，他们要政府作出改变。他说：“华盛顿这些人不知道这些，这件事正在影响大选”。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利上将也指出，军方只能从军事角度提建议，“在这个基础上，你们可以说最好拖它15年，但公众可能要的是不同的东西”。军方显然想让杜鲁门政府作出新的决定，至少是扩大“有限战争”的范围，同时大幅度增加军费和兵力，为最后的军事解决作好准备。但杜鲁门政府几乎不可能作出这种决断，即使它不考虑美国的经济能力、盟国的反对，及扩大战争的风险因素，它也不会再作这种选择。因为这对民主党的政治前途可能造成致命危险，政府一旦改变政策，共和党人立即会抓住这种变化攻击政府，说当初就应该听麦克阿瑟的话。所以，杜鲁门此时再作改变只会付出更大的代价。直至杜鲁门政府下台，朝鲜问题在战场和谈判桌上都继续处于僵持之中。①

① *FRUS*. *1952－1954*. V.6, pp.738－744; p.782; V.15, pp.480－481.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其次，杜鲁门政府也无法制订一项稳定的对华政策。1952年1月，丘吉尔在重新当选后访问了美国。1月5日，在总统游艇“威廉斯堡号”上，艾奇逊向客人承认，美国“面临着有关中国的最严重和最错综复杂的问题。”他说，“未来的对华政策不得不看中国人打算干什么，她可能还未达到做决定的地步”。在以后几天的会谈中，艾奇逊强调说，西方的对华政策现在“必须是实用主义的”，“我们必须随着目前的形势走，处理那些不得不处理的事，随着我们走下去，将来的形势可能会变得清楚些”。艾奇逊的这番话表明，尽管中国与美国在朝鲜进行着战争，但美国还没有定下一种稳定的对华政策。他似乎并不认为简单的敌视中国就能构成一种健全的对华政策。艾奇逊等待中国“做决定”的想法似乎表明，他并没有完全放弃1949年春天那种“等待尘埃落定”的想法。①

杜鲁门政府在对华政策上的这种优柔寡断也表现在对台湾的政策上。自从麦克阿瑟提出美国应在朝鲜使用国民党军队作战的建议后，美国的反华保守势力一直在督促政府采取这一方针。这一建议在政府内部也得到了有些人的支持，中央情报局局长沃尔特·史密斯将军在1951年12月和1952年1月两次写信，要求重新考虑对台湾和远东的政策。史密斯认为美国应把台湾建成一个

① *FRUS*, *1952－1954*, V.6, pp.741－743, 783－784. “等待尘埃落定”是艾奇逊1949年2月对一批国会议员介绍中国局势时所讲的一句话，原话是“森林中一棵大树倒下时，直到尘埃落定，人们才能看清它破坏的后果。”这句话后来被报界用来形容政府的对华政策处于犹豫观望中。美国和中国一些的历史学家们认为，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美国政府在对华政策上仍然举棋不定。见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Nancy Bernkopf Tucker, *Patterns in the Dust :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 and the Recognition Controversy, 1949－1950*; Dean Acheson, *Present at the Creation. My years in the State Department*. (New York, 1969,) p.306.

具有政治、经济和军事多方面重要性的反共反华基地。他认为政府应改变不使用国民党军队的政策，并认为美国应支持蒋介石返回大陆。①

1952 年春，参谋长联席会议也表示，应对一年前制定的 NSC－48 号文件中有关台湾的政策作某些修改。1952 年 2 月，他们提出了 NSC－128 号文件草案，希望在美国的援助下，台湾不仅仅建立一支防卫性力量，而且还要具有在“台湾之外从事公开军事活动的能力”。军方认为，由于东亚局势的变化和朝鲜战争可能打下去的需要，美国应该做好这方面的准备。4 月和 8 月，军方又两次提出，应考虑在朝鲜或在中国大陆使用国民党军队。陆军副参谋长赫尔将军要求政府明确立场，即美国究竟是否想把国民党军队建成一支“具有进攻性能力的力量”。他说美国必须面对这个问题，美国是否需要他们在某一时候发动进攻。国务院拒绝在这一问题上改变立场。他们认为，这样做会使美国被蒋介石拖入同中国的全面战争，它至少也会使美国的对华政策变得更加困难。为了不被指责为对共产党软弱，国务院也不得不作一点让步。他们承认，美国对台湾援助的目的“不仅仅意味着防卫能力”，在朝鲜战争继续打下去的情况下，可以建立“超出防卫需要的能力”。其实，杜鲁门政府从未认真研究过在停战实现后，美国的东亚政策应达到什么目的。然而，杜鲁门政府也不打算立即改变不使用国民党军队的政策，国务院官员在这一问题上闪烁其辞，一方面不想完全拒绝军方的意见，另一方面又不愿给国民党军队预先规定进攻使命。用副国务卿的话来说，是否要使用这支军队，“也许会有一个天赐良机”。对华政策方面的左右

① *FRUS*，*1952－1954*，V.14，pp.15－16.

徘徊表明，民主党政府在东亚地区缺乏一种基本指导思想。①

第三，对杜鲁门政府来说，更困难的是应付印度支那和东南亚局势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胡志明于 1950 年 1 月和 2 月秘密访问了中国和苏联，同毛泽东、刘少奇等人举行了会谈。通过这次会谈，中国共产党决定援助越南人民摆脱法国殖民统治，赢得民族独立和解放。中共中央决定派出陈庚、罗贵波等同志协助越南开展军事和政治斗争，并提供一些物质援助。在陈庚等人的帮助下，从 1950 年秋起，越南人民军逐步把法军赶出了北部的高平、谅山、老街、太原等地，巩固了边界地区的根据地。进入 1951 年旱季，人民军又发动了规模更大的攻势，法国殖民当局的统治地位日益恶化。面对这种局势巴黎只得呼吁美国给予更多的援助，并要求美国尽早作出保证，在所谓的中国可能“入侵”的情况下，派遣美军到印度支那作战。②

美国在 1950 年春正式承认了法国扶植的保大政权。并开始向法国殖民当局提供军事援助。到 1952 年初，美国已承担了法国在印度支那全部军事开支的三分之一。但是，杜鲁门政府对于美国是否要进一步卷入这场殖民主义战争却犹豫再三。如果美国拒绝法国的请求，法国就可能不得不退出这一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区，从而对整个东南亚产生难以预料的影响。如果美国准备直接干涉，那么卷入到什么程度，以什么方式卷入，会发生什么后果，这些也不是容易决定的事。

艾奇逊在 1952 年 1 月同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会谈时说，西方

① *FRUS*, *1932－1954*, V.4, pp.20－22, 31－39, 88－94.

② 穆欣：《陈庚大将》（新华出版社，北京，1985 年）第 669－870 页。有关法国此时的要求见 Acheson, *Present at Creation*, p.675.

“应当分析中国在东南亚采取行动的可能性”，他说西方可能“不得不作出决定，看东南亚是否值得战斗，以及如何去为之战斗”。此时民主党政府正遭到共和党不断的抨击，抨击的理由就是政府没有执行强硬的东亚政策。已被指责为“丢失”了中国的艾奇逊不想再承担“丢失”印度支那的责任。国务院承认，法国“失去印度支那将是最严重的发展”，但是他们却无法作出下一步的具体决定。国务院希望五角大楼对印支问题提出明确的方针，而军方此时对美国在军事上卷入印支，扩大海外军事“义务”持迟疑的态度，因为它认为这样将使有限的军事力量和军费更加不堪负担，而且也难以预料这一行动的政治后果。保罗·尼兹也认为，如果美国在印度支那采取军事行动，可能会危及朝鲜的停战前景。同样，军方也不想承担“失去”印度支那的责任，参谋长联席会议在同国务院举行的联席会议上要求政府作出政治决定，而在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一最高级决策层次上，政府却提出了要等待军事上的判断。国务院顾问波伦以调侃的口气说，这似乎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①

拖了半年之后，1952 年 6 月，国家安全委员会的 NSC－124 号文件“美国在东南亚的目标和行动方针”才最后形成。文件认为，印度支那的丢失会引起重大的“心理、政治和经济后果”。尽管文件列入了所谓中国“入侵”印支时美国可能采取的措施，如动用海军力量干预，但文件也指出，发生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很小，因为情况对中国有利，中国无需这样做。 NSC－124 号文件真正决定的政策是，美国继续向法国提供援助。这种政策实际上体现了艾奇逊的一个基本想法，即美国“不能再有一个朝鲜”。同时，它也体现了国防部长洛维特的观点：如果中国不用军事手

① *FRUS*. *1952－1954*. V.6, pp.738－741; V.12, pp.23－34.

段“夺取印度支那”，西方就可以用较长时间来挽回印支局势。在洛维特看来，为此“多花一些钱可能是明智的。”总之，杜鲁门政府虽然不太情愿地制订了应付“紧急情况”的措施，这只是要表明，杜鲁门政府赋予这一地区新的战略重要性，而所谓的中国“入侵”的假设其实并没有任何根据。杜鲁门政府当然也不希望要采取这些措施，它在印度支那采取的行动，并没有超过提供援助的界限。①

从上述分析可见，杜鲁门政府 1952 年的东亚政策缺乏明确的目标，也不具备稳定可行的方法。艾奇逊在年初曾保证，政府要“在远东采取有活力的行动，使远东形势朝着产生真正实力的方向发展”。但直到 1953 年初民主党政府下台，艾奇逊也没有采取什么“有活力”的行动，反而给人一种左右为难、举步维艰的印象。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盟国有不同的意见，国内麦卡锡主义猖獗，以及杜鲁门政府在 1952 年 3 月底已成为“跛鸭”，等等。但是民主党东亚政策中的矛盾也限制了这一政策的进一步发展和调整。

首先，“遏制”政策起源于美国对苏联的政策。当时在欧洲对抗双方阵营明确，并且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边界线。亚洲的情况则大不相同，亚洲各国民族主义力量的上升使“阵营”不易确定，殖民主义势力的瓦解，共产党参与或领导的民族主义运动使情况更加复杂。亚洲也不存在一条稳定和各方都认可的“边界”。艾奇逊在 1950 年春试图“划”出

① *FRUS*, *1952－1954*, V.12, p.71, 113. 5月 19 日在白宫召开的一会会议上，美国军方作了让步。不再坚持要有“政治决定”，并基本同意不改变原来的方针。但他们仍然担心美国可能会卷入一场“恐怕会打不赢的战争”。参见 *FRUS*, *1952－1954*, V.12, pp.91－92, 125－134.

这样一条线，但他的尝试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反而还被共和党保守势力指责为引发了朝鲜战争。正因为这种复杂的情况，杜鲁门政府无法在东亚确定一种恰当的“遏制”范围。①

其次，美国能用于安全和对外政策方面的能力总是有限的。朝鲜战争爆发后，杜鲁门政府大肆扩军备战，并使美国经济在一定程度上进入了战时经济轨道。这样做虽然在短期内急剧扩大了美国的军事实力，但也影响了经济长期发展的前景。更为麻烦的是，在亚洲不断扩大的“安全”需要影响了美国在欧洲承担的义务，把对欧政策放在首位的杜鲁门政府不愿意把已经紧张的资源从欧洲转用到亚洲。为了应付亚洲、中东等地越来越迫切的要求，杜鲁门政府在 1952 年全面重审了国家安全政策，审查的结论是，美国必须进一步增加国防和安全开支。由于民主党政府的高赤字预算，高税收的经济政策已经引起企业界和国会的批评，从 1952 年起，政府预算已经受到削减。在和平时期，进一步增加预算，扩大开支的余地是很有限的。

其三，杜鲁门政府把日本作为美国远东战略的核心，艾奇逊

① 关于亚洲的“划线”讲话是指艾奇逊于 1950 年 1 月 12 日在“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的演说。这篇演说提到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安全防线北起阿留申群岛，经日本及琉球群岛到菲律宾。由于艾奇逊在这里没有提朝鲜和台湾，因此后来遭致了共和党人的抨击，并被认为是朝鲜战争发生的原因。

②对国家安全政策全面审查的结果主要体现在 NSC－139 号文件“重审美国国家安全目标和战略”以及 NSC－141 号文件，“对美国国家安全计划的重审”。这两个文件没有改变美国的基本战略目标，但文件认为，美国面临最直接的危险已不是全面战争，而是“逐步和渐渐地损失一些对美国非常重要的地区。这最终可能使美国不经过全战争就落到孤立无援和极为脆弱的地步。”文件说的最主要地区主要指亚洲、非洲及中东。共和党政府上台后，认为如根据民主党的方针行事，美国就必须增加 200 亿美元的安全开支。 *FRUS*，*1952 － 1954*，V.2，pp.144－149，209－222.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在 1952 年初谈到，“远东局势的核心是建立充分的力量，确保日本站在西方一边，如果日本连同其武德和工业能力一起倒向共产主义，那将是世界格局中的最大变化。”但是一个废墟上的日本对东亚局势的影响几乎是微不足道的。美国要影响局势的发展只有两种可能，一是承认中国革命的现实，在这个基础上同中国打交道。二是进行对抗，通过对抗扩大自己的影响。但是，艾奇逊始终不能确定中国在美国远东战略中的地位。在这种状况下，要建立稳定的东亚政策显然是不可能的。

最后，艾奇逊不能摆脱中苏同盟对美国的不利影响。朝鲜战争以前，他寄希望于中国会走南斯拉夫的道路，希望同中国进行一点妥协来分裂中苏。朝鲜战争爆发后，这条路已不太可能走得通。但是他又面临另一种困难，即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政策只会使中国与苏联关系更为紧密。他似乎不能确定分裂中苏同盟与“遏制”中国这两种目标哪一个更为迫切。①

总之，民主党政府在东亚政策上面临着一系列的矛盾。产生这些矛盾的基本原因在于美国越来越想把东亚地区纳入其全球战略中去。尽管杜鲁门政府举步维艰，但是总的说来，它已经朝着这一方向走去，缓慢地但也更深地卷入东亚地区的各种问题里去。民主党政府在东亚政策上的混乱和不利处境，正好为共和党在大选中利用这一点提供了条件。

民主党政府在东亚问题上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地步，随着1952年大选的开始，它的东亚政策就不可避免地成为共和党的攻击目标。

在 30 年代大危机后，共和党已有整整 20 年未能入主白宫。1948年大选的失败给共和党的教训是，在对外政策上不能附和

① *FRUS*, *1952－1954*, V.6, p.783. V.2, p.219; V.6, p.783, 741.

民主党政府的立场。共和党为 1952 年大选制订的竞选策略是，极力宣扬美国面临的种种困难，声称只有共和党才能改变这种局面。共和党希望以此激起选民的情绪，并吸引那些平时不关心政治，但所占比例很大的普通公众投他们的票。因此，在竞选之前共和党就公开宣布要全面抨击民主党的对外政策，使民主党政府在这方面的失败成为“竞选中的主要问题”。①

在共和党内部存在着两大势力。一派是以中西部共和党人为主，另一派是以东部各州共和党人为主。比较起来，中西部势力在对外政策上持更为保守的观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中西部势力是著名的“孤立主义者”的大本营。战争爆发后，为了洗去“孤立主义者”的名声，他们摇身一变成了“亚洲第一主义者”。其原因是，他们对东部权势集团与关注欧洲的政策一贯不满。在战后，他们在对外援助，组织北大西洋公约以及“集体安全”等问题上继续持消极的态度。1952 年中西部共和党人拥戴罗伯脱·塔夫脱竞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资格。此人战前就是“孤立主义”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战后，他反对实施马歇尔计划，反对在欧洲驻扎美军。

为了给竞选铺路，塔夫脱在 1951 年秋出版了一本书：《美国人民的对外政策》，全面论述他的对外政策观点。塔夫脱在书中指出，杜鲁门政府的全面扩军政策对美国经济来说，是一个不堪忍受的负担，对生产具有“最大的破坏性”。在强调必须减轻美国经济负担的同时，塔夫脱认为应将有限的经费集中用于发展战

① R.A.Divine, *Foreign Policy and U.S.President Election, 1952 – 1960*. (New York.1974), p.8, 43; Ronald J.Caridi, *The Korean War and American Politics: The Republican Party as a Case Study*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Philadelphia, 1968).

略空军，确保美国的海空优势。他表示美国只需要保卫美洲，以及英国、澳大利亚和日本这样的岛国。他希望撤出驻欧美军，并用核武器威慑苏联，使之不敢发动对欧洲大陆的战争。塔夫脱的这种观点表明，他依旧不赞成与西欧结盟的“集体安全政策”。但在亚洲问题上，塔夫脱则赞成美国进一步的卷入。他指责民主党在雅尔塔出卖了蒋介石的利益，他支持麦克阿瑟的战略，提出应封锁中国和轰炸东北地区，并且鼓吹使用台湾国民党军队在华南地区进行牵制性进攻。塔夫脱的这些观点非常明确地表明，他是一个典型的“亚洲第一主义者”，他在美国对外政策的许多重大问题上与东部势力有重大分歧，他的削弱与欧洲防御联系的观点是东部势力决不能接受的。①

保守主义势力在对外政策方面的另一位代表是前总统赫伯脱·胡佛。1952 年 7 月，胡佛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言说：民主党在雅尔塔、德黑兰和波茨坦的“出卖”使数以亿计的人民“丧失了自由”。他说，尽管美国在欧洲花费了 350 亿美元的巨款，但西欧各国没有努力保卫他们自己。胡佛说，防止美国经济崩溃的唯一方法就是停止重新武装西欧，并发展美国的海军力量。关于亚洲政策，胡佛说“麦克阿瑟在战争中精辟地说过，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替代胜利，而政府却在我们出发的 38 度线上进

①有两本重要的著作探讨了共和党保守主义势力在冷战时代的对外政策观点和活动，这两书是：Justus D. Doenecke, *Not To The Swift, The Old Isolationists in the Cold War Era*, (Bucknell University Press, Lewisburg, 1979); Norman A. Graebner, *The New Isolationism: A study in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since 1950* (Ronadld Press, New York, 1956)；在后一位作者看来，保守主义势力的对外政策观点实际上是一种“新孤立主义”，他们具有强烈的反共倾向和“亚洲第一主义”倾向。塔夫脱的观点见 Robert A. Taft, *A Foreigh Policy for Americans* (Doubleday, Garden city, N.Y., 1951). pp.86－84; Caridi, *The Korean War and American Politics*. p.200.

行绥靖来代替它”。胡佛是强硬的亲国民党分子，他曾经指出，美国决不应承认中国共产党政权，只要美国继续支持国民党，在远东就会有一道阻止中共扩张的墙，就会有助于保卫菲律宾和日本，有助于“挽救”东南亚，而且，那“还会有在某一时刻使中国重新回到自由道路上的希望”。①

东部共和党人在国内经济政策方面与中西部共和党人有不少共同语言，但在对外政策方面，东部共和党人具有“国际主义”的观点。“国际主义”的东部共和党人希望，继续加强与西欧的联盟，加速重新武装西德。他们还希望确保战后美国在全世界的优势地位，扩大美国的海外利益。为了击败塔夫脱，东部共和党人推出艾森豪威尔来竞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艾森豪威尔在战争时期是欧洲盟军总司令，战后又是北约组织的首任司令官。他出身于中西部的贫寒家庭，凭着自己多年奋斗终于跻身于军界高层。他的经历和战争时代的卓著功绩使他成为普通公众心目中的“英雄”，他的个人形象对公众有很大的感召力。艾森豪威尔在国内问题上的看法和中西部共和党人接近。在竞选中他不断抨击民主党的赤字财政、高税收政策及国家经济控制措施。艾森豪威尔认为美国军事力量的基础是健全的经济，美国不能被过高的军事开支拖入经济崩溃的险境。他说“比起一个在战场上被征服的美国来说，一个破产的美国更是苏联的目标”。艾森豪威尔强调，为了同共产主义进行长期竞争，美国经济应有更健全和更稳定的发展。

在对外政策方面，艾森豪威尔是西欧联盟和集体安全思想最坚定的支持者、维护者。1952 年 6 月，他给负责起草共和党竞

① Gary Dean Best, *Herbert Hoover, The Postpresidential Years, 1933 – 1964*, (Stanford University Prss, Stanford, California, 1983) p.221, 333.

选纲领的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写信说，他希望竞选纲领“在促进集体安全方面是一个积极的，展望未来行动和领导的声明”。他说美国不能“单独生活”，“任何退回到我们自己边界的思想肯定会给美国带来灾难”。他表示决不允许动摇美国的集体安全思想和政策。艾森豪威尔明确指出，通过结盟关系确保和扩大美国的海外原料来源和市场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基石，他宣称自己将同任何对此政策挑战的人进行全力斗争。① 由此可见，艾森豪威尔与塔夫脱在对欧政策方面恰好是意见相左，没有共同之处的。

艾森豪威尔对亚洲事务了解不多，而且也不太注重。在竞选初期，他总是较为谨慎地谈论亚洲问题。6月12日，他在会见新泽西州共和党代表时说，朝鲜战争“不能用扩大它的办法来解决……如果我们不能结束这场战争，我们肯定也不能结束一场更大的战争”。19日，他还明确表示反对麦克阿瑟的亚洲战略。他说试图统一朝鲜和赢得传统的军事胜利将会冒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风险。他还指出，美国不应当在朝鲜使用国民党军队，因为台湾本身更需要它。在艾森豪威尔看来，日本才是西方文明在远东的“真正前哨”。他说不能允许“在朝鲜和台湾的轻率冒险而使日本的安全受到损失。”② 从他这些观点看，在大选初期，他同中西部保守主义势力在东亚政策上的分歧是比较明显的。

7月，艾森豪威尔在芝加哥全国代表大会上战胜了塔夫脱，

① Caridi, *Korean War and American Politics*, P.239; A.M.Schlesinger.Jr, *The Coming to Power*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 New York, 1978). p.411; DDE to Dulles, June 20, 1952, Cabinet series, Box 1. DDE papers as President, Dwight D.Eisenhower Libary, Aibelin, Kansas, U.S.A. 下文中引用的档案除注明出处的，均引自该馆。

② Ambrose, *Eisenhower*, Pt.1, p.533; Caridi, *Korean War and American Politics*. p.217.

获得共和党总统侯选人提名。党内两大势力的较量暂告停止。竞选的热点转向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争夺上。在前一段时期中，共和党人在对外政策方面大肆攻击民主党的“雅尔塔背叛”，声称要“解放”东欧“被奴役的国家”，等等。这些言论并没有引起美国公众的多大反应，反而导致了欧洲盟国的不满。于是，艾森豪威尔的竞选班子决定改变策略，集中攻击民主党的东亚政策。此时，美国公众对朝鲜战争的久拖不决已经十分不满。民意测验表明，大部分美国人认为这种僵持局面是不能忍受的。竞选班子认为，艾森豪威尔必须在朝鲜战争问题上大做文章，指责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想象力”，没有作出“足智多谋”的努力来结束这场战争。9 月 4 日，艾森豪威尔在费城发表竞选演说，他攻击民主党丢失了中国和朝鲜。他说美国当初不得不参战的原因是，杜鲁门政府曾公开宣布，“我们已经把朝鲜从我们直接控制的范围里勾掉了”。①

由于要得到中西部共和党人的支持才能赢得最后的选举，艾森豪威尔还必须同塔夫脱谋求合作与妥协。9 月 12 日，他们两人在纽约进行了一次秘密会谈。会议结束后，塔夫脱告诉记者，他决定在下一阶段的竞选中支持艾森豪威尔。同时，他也告诉记者，他与艾森豪威尔在对外政策方面的分歧只是“程度上的不同”。显然他们在对外政策方面达成了某些谅解。9 月份艾森豪威尔不断在朝鲜问题上攻击民主党，10 月 3 日，他在演说中提出了“以亚洲人打亚洲人”的观点，并表明将在亚洲采取更强硬的立场。“以亚洲人打亚洲人”的想法得到了塔夫脱的喝彩，但却遭到了某些东部共和党人的批评。在 10 月 24 日，艾森豪威尔

① Dulles to DDE, Aug.21, 1952, Cabinat series; DDE papers as President, Box 1; Caridi, *Korean War and American Politics*, pp.233－236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